◎文学聚焦

英雄主义：军旅文学的永恒母题

朱向前　徐艺嘉

以《七律·长征》为代表的毛泽东长征诗词体现的毛泽东的英雄主义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是一种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在自力更生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同时也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心声和向世界宣告的英雄宣言。

这宣言，就是诞生于炮火中的军旅文学的内在英雄气质和精神底色。英雄主义既是军旅文学的启蒙向导，也是军旅文学不变的灵魂，并在漫长的历史推演中展示出不同的叙事样态。

从单一战争事件转化为对战争中个体“人”的关注

新中国诞生之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左右，一批长篇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作品作为时代主流的重头战争小说，共同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这些作品的价值取向有强烈同一性，受苏联卫国战争文学高亢与激昂风格的影响，普遍旋律是乐观的英雄主义与浪漫的理想主义相结合，情节结构方面则偏向于中国古典战争长篇小说的传奇性和故事性。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社会潮流突变，军旅文学中的英雄情结尚在，但在表现方式上有所转变。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南线战争小说有徐怀中《西线轶事》、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作家的关注点从单一的战争事件转化为对战争中个体“人”的关注，开始着力描画战争对个人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不仅为新时期军旅文学开拓了写作空间，也为后来者如朱秀海《穿越死亡》《音乐会》等富有战争反思意味的小说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以朱苏进为代表的《射天狼》《凝眸》《第三只眼》《炮群》等作品无形中开辟了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又一战线，与“新时期”战争小说相映生辉。这些作品中没有刺刀见红的悲壮，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和平时期的军人注定是平凡的，有普通人一样的痛苦、烦恼和负担，但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痛苦中坚实前进，同样表现了立体、复杂的军人形象。英雄主义的影子在这些小说中看似隐退，实则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和平环境中军人的理想设计与现实失落、无私奉献与自我价值的职业悖论始终存在，最终逼近人的根本生存困境，达到文学应有的人文关怀，进而超越军旅题材的局限，达到更为开阔的艺术境界。

在这一阶段，英雄的光环逐渐褪去，读者更能理解英雄失语后的落寞以及落寞之中的坚持。而回望历史之时，出现了莫言的《红高粱》、乔良的《灵旗》等具有当代意识和强烈审美特色的小说，以一种全新的历史视角审查人性、道义、战争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企图获得一种新的接近或是诠释历史本质的途径。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作品之中英雄主义幻化为一种隐性图腾，以鲜活的意象性体现文学形式的张力。

时代在延续，新的思想潮流决定了每个时段文学的不同面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个体意识崛起，一方面，以阎连科、陈怀国等人为代表的新时代作家以“农家军歌”唱响了一群农家子弟逃离土地的悲凉与迷茫，给人以“视点下沉”之感；另一方面，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弹道无痕》《决战》等作品粗线条、大泼墨，以凌厉豪放的风格闯出一条新的军旅文学之路，让新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重建成为可能。在英雄主义的基调“左顾右盼”而无所着落之时，柳建伟以一部《突出重围》横空出世，以描写一场模拟高科技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大演习为蓝本，歌颂了当代优秀中国军人在技术落后、和平条件下长期滋养的观念陈旧、个人私欲碰撞以及外界物质利诱等因素的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血路的英雄气质，是对和平年代军旅文学写作思路的一次冲击。

新世纪开启英雄主义新篇章

新世纪以来，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一辈“新生代”军旅作家创作了一批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反映个体军人生命及情感经验的小说。这些故事大多映射作家们自我成长经验。在个体经验创作遭遇瓶颈之时，王凯、裴指海、西元等青年小说家主动寻求突破，在历史追寻和现实对照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坐标系作为自己的写作脉络，开启属于青年作家的英雄主义新叙事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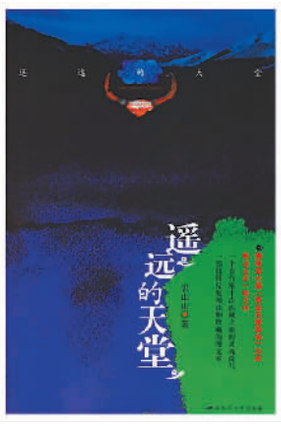
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有不少人对新世纪以后的英雄主义受众产生质疑，但碎片化信息时代的军旅电视剧，诸如《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等作品同样能够引发全民热潮，而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风声》《十月围城》在当代时尚元素的包装下一样焕发出新的魅力。撇开类型化的叙事技巧不谈，真正打动受众的仍然是让人切实认同的英雄主义崇高美感，徐贵祥、柳建伟、石钟山等作家的军旅文学作品在改编成电视剧后获得了不俗的收视反响，这说明英雄主义仍然有广泛的大众心理基础。

新世纪以来，军旅电视剧蓬勃兴起而长篇小说相对黯淡，出现了一批以报告文学、散文集、诗集和跨文体写作支撑的宣扬英雄主义主旋律作品。

王树增的长篇报告文学《解放战争》（2009年）和《抗日战争》（2015年）以军人对军队历史独有的钟情和痴恋回望历史，以新的历史视角填补以往历史认知中的疏漏和空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建构了作家个人化、同时也是人性化的历史框架体系。

彭荆风的长篇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2009年）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作品描述的是一场有近200万人参与的，在巴山蜀水间，跨越川、康、滇、黔四省，在广大区域上同时展开的大战役。作家运用构架长篇叙事文学的节奏感，汲取小说创作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优势，有条不紊地将众多的事件和人物连缀起来，形成一种庞大而不杂乱的文学景观。

同获第五届“鲁奖”（2010年）殊荣的还有王宗仁的散文集《藏地兵书》和刘立云的诗歌集《烤蓝》。《藏地兵书》是军人作家王宗仁融入了太多自己生命印记和体验的藏地之书。书中描述了汉藏两地的青藏之路在20世纪 50年代以来的贯通，表达了对把生命奉献在青藏土地上的军人的歌颂。“烤蓝”则是一种意象，是诗人“必须说出来的那种蓝”。武器由钢铁锻造，它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烤蓝，而军人经过军队大熔炉的锻造，也给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富有英雄主义情结的烤蓝。此外，裘山山的散文集《遥远的天堂》（2006年）斩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桂冠，讲述西藏士兵们的光荣与梦想；马晓丽的短篇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表现中俄边境一个普通军人在退役之前的坚守，具有浓厚的军人尚武意味。



徐怀中的《底色》（2013年）复活了一段跨国界的战争历史，是作家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虑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体写作，写法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底蕴却又是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作品从中越两个国家亦友亦敌的不同视角来反思战争中不同民族的家国情怀，并在复杂纠结的情感中探索和彰显人性。

金一南的《苦难辉煌》（2009年）同样是跨文体写作，从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力量、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入手，记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恢宏壮阔的历史进程，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建立红色政权的艰辛和伟大。作品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是英雄主义传播的良好示范。

朱增泉的5卷本《战争史笔记》（2009年）可算作跨文体写作的典范。自古以来，史料类书籍的叙述体例种类繁多，而这部作品新颖之处在于，作者融合了各家体例之所长，独辟蹊径，探索出一条灵活而简易的叙事模式。作品选取了教科书般的简明结构，将大段的叙述切割成短小精悍的段落，行文明晰畅快。将不同朝代汇入整体的时代大循环中加以考察，是读者探寻古代战争史路的一把密匙。

略作梳理不难发现，军旅文学在90年的历史中，尤其在新中国以来的征途上，根据时代特色在不同时期演奏出气象万千之乐章。旨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目标的军旅文学需要有血性、有担当的文学作品，这同样离不开英雄主义。时代发展再迅猛，其间总有一些稳定的常态，而亘古不变的精神特质才决定了足以扣动人们心弦、引领人类发展的本质力量。对于军旅文学来说，这种本质力量就是英雄主义。

◎作家谈

探测军人的精神宇宙

王　凯

小说集《沉默的中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我2006年到2016年间发表的几个中短篇，换句话说，它收入了我最近10年中那些还不算虚度的时光。其中《沉默的中士》写得最早，初稿是我在空军机关办公楼一层值班室值班的10天里完成的。那会儿我30岁，刚借调到机关帮助工作。那几年我头发还算多，不像现在掉得那么厉害，好在那时我是O型血，现在依然是，所以我一直清楚地记得身上被蚊子咬出的那批大包。最后一个中篇《白鸽》，则写于2016年在齐齐哈尔出差期间。那一个月里，我每天清晨进场跟班飞行，下午两点左右回到宿舍开始写作，并在战斗机的呼啸声中把小说的背景换成了机场。齐齐哈尔的夏天非常迷人，强烈的紫外线让我回想起自己在西北戈壁度过的青春岁月。我们每天晚饭后散步八到十公里，机场外的路边是一望无际的蔬菜大棚，塑料棚膜在夕阳下闪闪发亮。

当然还有书中其他的小说，它们讲的故事不同，但都同军人有关。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写的所有小说都是关于军人的。我写过曾经的军人、现在的军人甚至未来的军人，有时我会觉得这么写下去前景不太乐观，在和平年代书写军人，有点像今天腰里还别着个传呼机一样不合时宜。有一次我穿着军装在北京西站接人，不一会儿时间，差不多有20个人先后走上前与我搭话。最初一秒，我以为他们被我身着军装的英武形象所吸引，但第二秒时我就明白自己想多了。他们是在向我打听列车时刻和出站信息。明摆着，他们都把我当成了铁路工作人员。在我看来，军装和铁路制服的区别就像苹果和西红柿一样迥然相异，而在他们眼里，两者居然没有分别，这让我有些泄气。

想想我读过的那些军事文学名著，《西线无战事》《林中阳台》《第二十二条军规》《裸者与死者》和《高山下的花环》，它们都与宏大的战争有关，都与人类最暴烈的行为有关，都与生与死这样的终极命题有关，而我写的，都是些平淡无奇的军人生活，绝大多数小说里甚至连一支枪都没有出现过。

但后来我想通了，毕竟军人首先还是人，军事文学首先还是文学。小说里有没有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对于心灵的探究。我越来越觉得，也许小说更重要的任务不是扩张而是深入，不是建构而是内省。精神宇宙的幽深与无限并不亚于现实的宇宙。我们在物质宇宙中施放了很多高精尖设备：卫星、空间站、宇宙飞船、太空望远镜和深空探测器。我们怀揣着因盲目带来的不安和渺小引发的自卑，试图去搞清楚我们的存在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是现象还是本质，抑或整个宇宙只是另一个更大尺度空间内的一个小小的粒子？与此相类似，人类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对自己不完美的焦虑，也会令我们忍不住去探究自己，探究我们的精神宇宙，诸如它因何而来，为何如此，是否具有尽头和黑洞之类的问题。毕竟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内置一个宇宙，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观测，要不然的话，我们总是难以真正了解自己，我们与内心对话时总是感觉陌生，我们的精神宇宙中有着太多不确定又无因果的存在，而我们不想一次次在此间迷失。

这样说的话，我好歹也算个曾经施放过宇宙探测器的人了。只不过我更希望探测的，是军人的精神宇宙。无论如何，军人书写军人，至少不会过于外行。至于我的小说探测器究竟飞了多远，这倒是个问题。我怀疑它至今还在近地轨道附近漂着，但就算这样，我也觉得很不错了。

◎新作评介

本色英雄青史外

——评徐贵祥《鲜花岭上鲜花开》

汪　政

徐贵祥曾被评论界誉为“正面强攻”的军事文学作家，所谓正面强攻，指的是他善于营构宏大的结构，严肃的主题，善于塑造充满血性与阳刚之美的军人形象，指的是作家拥有驾驭阔大场面，把控重大题材的力量，比如他的《历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等等。但是他的中篇新作《鲜花岭上鲜花开》却以“迂回包抄”的手法给我们讲述一个深情的故事，曲折地表达了对英雄迟到的礼赞。

说《鲜花岭上鲜花开》叙事上的迂回包抄，是缘于它多线索结构与故事结构的层层叠加。从小说中的人物毕伽索的视点看，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奋斗史与自我救赎史；从亓元、乔梁看，这是当下青年进行中的成长史；从查林看，这是一个落魄文人由利到义的心灵史；而在韦子玉、弓珲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型政府官员的胸怀和理想；如果我们集中注意力到干街这个皖西的山间小镇，竟可以看出中国乡村的变迁与现代乡镇建设的现实与未来……而在这些表层故事的后面，是毕启发，是乔如风、乔大桥等几代军人的辉煌、屈辱与坚守。从这样的概括与转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作品内容的丰赡，看出作家建构复杂叙事的能力了。当我们依凭这些线索从不同角度进入作品并殊途同归来到故事的结局时，便会渐渐明白作品的内核是一个历史的迷团，是扑朔迷离的流波之战。故事的主人公竟是游离于故事主干的毕启发，他是毕伽索的父亲，一位新四军的排长，一个战场上的“逃兵”，一个偏僻小镇的裁缝，一个被人们鄙视的废人，一个每天喝上二两酒的口齿不清的老人……

徐贵祥

一切都是为了解开那个谜团，一切都是为了洗去莫名的冤屈，一切都是要让英雄堂皇地站在人们的面前，一切都是在向那些无名的战士们致敬。与徐贵祥以往的许多作品不同，他没有正面描写硝烟弥漫的战场，也没有用传奇的故事演绎战争，甚至没有对英雄完整的描述。但是，英雄就在那里，他们从迷雾中走出，从歧义丛生的传说与污名中走出，一步步清晰、明亮、凸显，终归立于天地之间。

《鲜花岭上鲜花开》让我们再次意识到了一种特殊群体的存在价值，那就是英雄。英雄是人类的杰出者，他们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继而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自觉践行这些理想与信念，并且创造出超越同侪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将这些置于高出自己生命的崇高地位，慨然担当，视死如归。因此，英雄的意义与价值总是具有超越性与感召性的，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许会沉入历史，但他们的精神却与日月同辉，影响着同代人甚至永远。英雄总是集时代、民族与国家精神于一身。不能设想一个民族与国家没有英雄，更不能想象一个时代、国家与民族会忘记或漠视英雄，倘若如此，精神便无从体现，信仰更无处安放，那样的社会必定是失去了脊梁的软体和失去了凝聚力的散沙。这也许是《鲜花岭上鲜花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徐贵祥说：“我们必须擦亮我们的心，用文字，用文学，表达我们对英雄的敬重。发现英雄，书写英雄，呼唤英雄，是我的职责所系，也是我的理想信念。”这样的写作理想于今难能可贵。

《鲜花岭上鲜花开》写了英雄，但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对英雄的想象，可能会改变我们经过传统英雄叙事阅读而定型了的审美经验。徐贵祥告诉人们，英雄是多种多样的，英雄的写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毕启发与传统的英雄形象差距实在太大，他既无英武的形象，也无豪言壮语。将他的业绩细数开去，也就是在茅坪战斗中打死一个鬼子，在流波与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他的后半生不但乏善可陈，还因为负伤离队背负了“逃兵”的恶名。然而，当历史的细节层层打开时，谁又能说他不是英雄呢？那种初上战场的一战成名，那种突发情形中的果断出手，那种非常情境中的忍辱负重，那种一直将战友铭记于心的手足情义……小说固然有像韦梦为那样潇洒威武、气冲霄汉、名满天下的豪杰，也有毕启发这样平凡朴素、命运多舛、已经没身人海的百姓，他们都是英雄。而且，《鲜花岭上鲜花开》用力所在恰在后者。丰富的生活积累，特别是革命老区的历史让徐贵祥明白，在那些名垂青史的英雄榜的后面，是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而这部作品正是作家通过毕启发这一形象的塑造向那些沉睡在大山深处、历史沟壑的英雄们送去的一个永远是迟到的但却是真诚的敬意。

《鲜花岭上鲜花开》，与其说是写英雄，不如说是发现英雄。这才是小说真正的主线与文心所在，也是作品最具价值的主题之一。这一价值固然是对英雄的重新发现，让英雄归位，还英雄尊严，更重要的却是发现的过程与发现者形象的塑造。这些发现者的形象各具个性。毕伽索是毕启发的儿子，他成长于特殊的年代，亲身感受到“逃兵”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伤害。当毕伽索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时，他迫切需要去掉父亲头上的这顶帽子。为此，他不惜重金买文造假，他不但要去掉父亲“逃兵”的恶名，而且要让父亲作为英雄登上故乡的名人墙。一开始，毕伽索确有功利与私心的考虑，但随着故事的进展，他不需要造假了，他发现了父亲真正的历史，父亲是货真价实的英雄！父亲的历史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在寻找和发现中，毕伽索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和人格上的脱胎换骨。相比起毕伽索的这种精神涅槃，亓元、乔梁，特别是亓元，他们对英雄的崇敬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亓元之所以加盟梦为公司，就是因为传奇英雄韦梦为的感召。当她偶然得知毕启发的遭遇和毕伽索的心愿后，便暗中开始了对毕启发历史之谜的寻访与索解。与毕伽索一开始的动机和手段有别，亓元是凭着真诚之心，以理性和科学去洞幽探微、寻根找据的。正是亓元和乔梁，包括毕伽索、查林的努力，真相水落石出，毕启发终被发现和承认。无论是亓元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还是毕伽索后来人生境界的升华，作品都以强大的艺术力量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告诉我们，英雄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对人心的感化、精神的提升、性格的塑造似春风化雨，又如磁石引针。尤其像亓元、乔梁这样的形象无疑给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当代青年的独特视角，打破了人们对他们的概念化想象。当代青年远不是戏弄历史的嬉皮士，不是抛掷价值的虚无者，也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身上也有着向善的愿望，也有着英雄的基因。

好的作品就是如此，它指认人性之美与生活之善，给人慰藉，给人希望。